

211

西南财经大学“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邓敏 著

通货紧缩国际传导： 基于国际经济视角的 研究

TONGHUO JINSUO GUOJI CHUANDAO
JIYU GUOJI JINGJI SHIJIAO DE
YANJIU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中国金融政策与国际金融政策的协调

李海林 杨春华

通货紧缩国际传导： 基于国际经济视角的研究

◎ 中国金融政策与国际金融政策的协调
◎ 中国金融政策与国际金融政策的协调
◎ 中国金融政策与国际金融政策的协调
◎ 中国金融政策与国际金融政策的协调



西南财经大学“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邓敏 著

通货紧缩国际传导： 基于国际经济视角的 研究

TONGHUO JINSUO GUOJI CHUANDAO
JIYU GUOJI JINGJI SHIJIAO DE
YANJIU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货紧缩国际传导:基于国际经济视角的研究/邓敏著.一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5
ISBN 7-81088-503-0

I . 通... II . 邓... III . 通货紧缩—研究—世界
IV . F8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6101 号

通货紧缩国际传导:基于国际经济视角的研究

邓敏 著

责任印制:杨斌

责任编辑:赖江维

封面设计:杨红鹰

出版发行: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 55 号)
网 址:	http://www.xypress.net
电子邮件:	xypress@mail.sc.cninfo.net
邮政编码:	610074
电 话:	028-87353785 87352368
印 刷:	西南财经大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mm×210mm
印 张:	11.37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81088-503-0/F·434
定 价:	22.80 元

1. 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可向本社营销部调换。
2.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前 言

2002年10月17日，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发表了《中国因素》报告，日美经济界的一些人士认为，报告提出了中国通过商品出口把自身的通货紧缩转向全球的观点，并呼吁中国进行汇率制度改革，使人民币升值以抵消中国出口价格对世界通货紧缩的影响。由此，国际上刮起了一股“中国输出通货紧缩”的舆论旋风，“人民币升值论”也演绎出一波又一波的高潮，一些国家就此问题一再对中国施加压力，当时深陷通货紧缩的日本充当了批评中国的急先锋。

针对沸沸扬扬的国际舆论，中国的许多学者曾撰文指出，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在世界贸易和美日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中国没有输出通货紧缩”。与中国学者相呼应，国外不少人士发表了支持中国的观点，连曾经被认为是“中国输出通缩论”的始作俑者史蒂芬·罗奇（2003）也说，“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只占日本GDP的2%少一点”，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过去五年平均是16%，但是，目前中国的出口只占到美国进口总量的10%，占GDP的1%，和日本一样，很难让人相信中国的出口会对美国价格水平产生较大影响”。

那么，中国究竟有没有输出通货紧缩？其他国家是否输入了通货紧缩？或者中国也输入了通货紧缩？或是有关国家相互传输了通货紧缩？国际贸易及汇率在通货紧缩的输入与输出中到底起什么作用？通货紧缩的传输在什么条件下、通过什么机制发生？这一串串的问题，归结起来就一个问题——通货紧缩的国际传导，

即通货紧缩因素在国际间蔓延并造成一国通货紧缩影响他国经济运行的现象^①。很显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首先，通货紧缩国际传导是一个危害极大的经济问题。英国《经济学家》的观点曾经认为，通货膨胀是一个老牌的敌人，而通货紧缩是一个新的、可能更加危险的敌人。作为这个可怕的“敌人”在国际间游走的表现，“通货紧缩的国际传导可能会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再度升起”^②。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全球的贸易摩擦、经济摩擦会相应增加。同时，通货紧缩的国际传导可能加大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失业问题。凯恩斯在《劝言集》中指出，由于通货紧缩的竞争性活动，每个国家都力图使自己的价格下降速度比其他国家更快，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失业扩大，企业亏损达到难以忍受的地步。不仅如此，在世界经济运行中相关问题加剧的情况下，贸易保护、失业、亏损等会反过来加深有关国家的通货紧缩及其国际传导。这样，各方面问题相互加深、恶性循环的结果，就可能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打击，甚至可能引起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和危机。在较早出版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通货紧缩不仅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概念，而且几乎被当作经济萧条的同义语在使用^③。

其次，经济问题是关乎政治和安定大局的问题，尽管马克思所强调的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关系由于种种原因曾经被忽略，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也一度相分离。然而，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的兴起，经济、政治、国际关系

^① 邓敏：《论通货紧缩的国际传导》，载《绵阳经济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4）。

^② 钱小安著：《通货紧缩论》，68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③ （美）A. 加利·西林著，李扬等译：《通货紧缩论》，序言部分第 3 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之间的密切联系备受关注，这反映了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联系日益密切的客观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货紧缩国际传导使经济状况恶化、经济摩擦增加，由此会衍生出外交摩擦、政治摩擦。当经济、政治各方问题交织加深时，还有可能导致军事问题。这样，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将受到影响，对各国来讲，这种影响造成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仅就贸易秩序来看，英国《金融时报》在 2005 年 11 月 2 日发表的文章便以《如果贸易自由化失败，世界可能失去一切》为题，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多哈回合的多边谈判失败，世贸组织将被削弱，弱肉强食局面将会出现，全球政治紧张局势将会加剧。

再次，由于通货紧缩的发生机制是存在于商品货币关系内部的，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决定了通货紧缩具有多发性特征；同时，在开放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经济的紧密联系使通货紧缩的国际传导具有必然性——只要国家之间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一旦有国家发生通货紧缩、存在通货紧缩国际传导源，通货紧缩的国际传导就会实际发生。这样，通货紧缩的多发性特征与其国际传导的必然性交互作用的结果，使通货紧缩的国际传导也具有多发性特征。

不仅如此，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来，随着前苏联、东欧各国纷纷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各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世界经济融合的步伐不断加快，经济全球化趋势及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明显加深，市场经济制度内部各因素既矛盾又统一的结果加强了各国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的同步性，通货紧缩在国际间的传导具有更多的渠道和更大的纵深发展的可能。在这种趋势下，当前国际经济运行中实际存在的种种问题，诸如生产能力过剩，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居高不下，日本的通货紧缩阴影，欧元区的经济困难，等等，所有这些又都加大了通货紧缩及其国际传导再现的现实性。

可以肯定，无论经济运行中是否实际存在通货紧缩及其国际传导，研究、防治这种具有多发性、现实性和极大危害性的现象，都是关系到各国经济及国际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然而，对这样一个极具实践意义的问题，理论研究尽管成果不菲，却依然任重道远。

从理论发展的轨迹来看，大卫·休谟的价格—黄金流动机制在汇率和价格、国际收支和汇率变动之间建立了有机的联系；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时期，经济学家们对通货紧缩的国际传导进行了重要的研究；二战之后的较长时间里，西方经济学家在研究通货膨胀国际传递的过程中对通货紧缩国际传导有所涉及；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后，关于全球通货紧缩及其影响的不同意见汇集在一起，引发了西方经济理论界关于通货紧缩的争论^①。

经过长期的理论积淀，西方经济理论界在研究通货紧缩及其国际传导的过程中先后形成了许多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在关于金本位制与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的理论中，除价格—黄金流动机制外，一价定理和 Mundell-Fleming 模型对国家之间的价格联系也做了解释。而货币学派则通过强调货币数量的相对变化和国际货币本位制的作用，分析了通货紧缩的国际传导。作为货币主义的延伸，国际收支调节的货币分析强调货币均衡对国际收支的影响，认为国际收支不平衡在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与货币主义的观点不同，Keynes 主义者从债务的数量与结构变化的角度，分析了债务及金融脆弱和心理因素等对通货紧缩的影响。作为 Keynes 主义的延伸，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包括弹性理论、吸收理论和内外均衡协调理论，则分析了影响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的多种因素。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通货紧缩理论的主流观点逐步由重视

^① 王广谦主编：《20 世纪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进展与述评》，169 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货币金融因素分析转向强调实体经济因素分析。不过，就具体观点来看，学者们的研究有供给论和需求论之分，加利·西林等是立足于从供给的角度解释通货紧缩的代表，而克鲁格曼等则强调从需求的角度看问题。同时，克鲁格曼还认为，通货紧缩是流动性陷阱的结果。除克鲁格曼外，麦金农的研究也涉及到流动性陷阱。麦金农认为，基于浮动汇率制度的国际套利活动会使一国陷入流动性陷阱，也会促使其发生通货紧缩。利用这个分析框架，麦金农和大野健（2000）指出，浮动汇率安排下日元汇率长期的升值预期，是使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陷入流动性陷阱和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

在上述的理论演进过程中，西方经济理论界分析了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的机制。综合而论，这些机制主要包括价格传导机制、国际贸易乘数机制、国际收支差额传导机制、汇率传导机制。其中，在汇率传导机制方面，学者们对浮动汇率制的通货紧缩国际传导效应有明显的分歧。根据货币主义以及深受其影响的有关流派的分析，固定汇率是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的前提，而浮动汇率制度对这种传递则具有“绝缘性”。与此观点不同，不少学者认为浮动汇率不能够保证国际收支的平衡，汇率机制本身是可以传导国外的通货紧缩因素的，在这一点上，除麦金农和大野健关于日本通货紧缩的代表性观点外，金德尔伯格甚至认为浮动汇率是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的主要机制。

在中国，通货紧缩是个新生事物，因此，中国经济学界的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1997年10月中国全国零售物价指数首度出现负增长之后，随着物价的不断走低，中国理论界才逐渐掀起了研究通货紧缩及其国际传导的热潮。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理论界对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的现有研究，主要表现在应用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些理论观点具体分析四个方面的问题，即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中国通货紧缩形成中的国际因素、亚洲金融危机影

响世界经济的途径、国外通货紧缩因素传入中国的具体机制。

综合而论，国内外学者关于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的研究基本都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因此对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在不断总结历史教训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理论本身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为理论研究的继续深入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为防治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的实践工作提供了有积极意义的指导。不过，从另一个侧面讲，现有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必须思考的问题。

首先，休谟的理论成立的条件是自由贸易、完全竞争、金本位等，这符合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基本情况，因此在一战之前的金本位时期，休谟的理论在西方理论界影响很大。但是，在金本位制度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今天，休谟的理论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由于休谟忽略了货币价值变动的实质，颠倒了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的关系，因此其理论不可能从根本上正确解释货币流通量与商品价格的关系。

其次，从国际收支理论来看，其弹性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大危机与金本位制度崩溃的时期，因为它适合当时西方各国的需要而且填补了古典国际收支理论失效后的理论空白，因此在西方经济理论界曾经长期流行。但是，由于该理论是建立在局部均衡分析的基础上的，加之其假定条件不符合实际，而且忽略了汇率变化的收入效应和支出效应，因此其局限性是不言自明的。至于国际收支吸收理论，由于它忽略了资本账户，仅仅把经常账户作为分析的中心，这也不符合现实经济运行的客观情况。国际收支货币理论将国际收支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研究，这有利于反映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交易对一国物价水平的影响。但是，由于该理论以货币数量学说为基础，它强调的是货币因素在传导中的作用，这就必然造成其对实体经济因素及经济政策在通货紧缩国际传导中的影响的忽视。

再次，前述介绍的关于通货紧缩国际传导机制的各种观点都是基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的，这决定了其受制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也使之忽略了传导机制的多样性，以致终究没有能够全面分析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的各种机制及其彼此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这不仅反映出现有理论在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通货紧缩国际传导机制方面的不深入、不系统，而且表明，即使是对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些相互作用的力量如何导致一场世界性萧条的机制还了解甚少”(A.G.肯伍德、A.L.洛赫德，1997)。

此外，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现有的研究更多的侧重于从一国或地区的角度分析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的途径及治理对策，而从国际经济的角度研究通货紧缩的国际传导及防治对策的工作却做得较少，这既不符合通货紧缩国际传导作为国际性问题的特征，也不符合通货紧缩国际传导影响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实际。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现有的理论研究在指导实践时陷入了两个不利：一是局限于一定历史条件的理论缺乏对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的一般机理的分析，缺乏对各种传导机制的内在联系的分析，于是，在研究通货紧缩及其国际传导的原因和防治对策时，很容易忽略各层次因素和各种传导机制的综合作用，以致常常产生应该从货币层面还是实体经济的角度，或是从供给还是需求的角度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分歧，这极不利于从各个方面采取综合治理措施，有效防治通货紧缩及其国际传导；二是局限于缺乏国际经济视角的研究，这不利于国际社会共同致力于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的防治工作，从而会给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的有效防治及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稳定和世界各国的持续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进一步分析，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理论界在关于通货紧缩的一些基础理论上的分歧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在诠释通货紧缩含义时，理论界存在较大的分歧。在国外，主要

的观点可以分为“单一要素论”和“三要素论”；“单一要素论”较“三要素论”更为多见。“三要素论”认为通货紧缩必须同时包括物价连续下降、货币供应量连续下降和经济增长连续下降三个要素；“单一要素论”则认为通货紧缩就是物价的持续下降。和国外的观点相比，中国经济学界关于通货紧缩含义解释的观点更多，诸如易纲（1999年）的“两个特征一个伴随”，即商品和劳务价格的持续下跌和货币供应量持续减少，伴随着经济衰退。另一方面，对概念解释的观点纷呈导致了学者们关于通货紧缩形成原因的分歧。例如，凯恩斯依据通货紧缩是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这一定义，从实体经济层面出发解释通货紧缩的形成原因，认为失业、通货紧缩和萧条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而弗里德曼则认为，通货紧缩首先不是价格水平的持续下降，它是一种货币现象，是货币流量的增长不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而导致的价格水平持续下降。最后，由于对通货紧缩的含义、形成原因等基础性问题没有一致的认识，学者们在利用不同的含义解释和原因分析去认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通货紧缩问题时，便对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的原因及机理等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从而出现了从供给还是需求的角度，或是从货币还是实体经济层面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分歧，以致忽略了各层次因素和各种传导机制的综合作用。

由于在基础理论方面的分歧，人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及其政策主张大相径庭。在判断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形势时，英国《经济学家》的文章认为，在美国以外的世界许多国家，消费价格下降的风险（通货紧缩）达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而法国《世界报》的文章则认为，虽然价格下跌现象比较明显，但那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工业品价格下跌，况且欧美经济表现良好，因此不必担心会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和大规模的经济萧条。在判断中国当时的通货形势时，易纲认为，中国的物价虽然连续下跌，但货币供应量并未减少，因此不能说中国

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而胡鞍钢则依据价格水平的下降状况，认为中国不仅全国出现了通货紧缩，而且各地也普遍进入了通货紧缩阶段，局部地区通货紧缩还相当严重。在分析中国通货紧缩的成因及对策时，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当时发生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是内需不足，需要通过扩大内需解决问题。吴敬琏则认为在治理通货紧缩时不仅要采用“凯恩斯主义”，还要采用“供给学派”。

从更深的层面分析，上述认识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研究方法的不足所造成的。如前所述，西方经济学界对通货紧缩及其国际传导的研究有悠久的历史。但是，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通过建立经济模型以引申出经济原则和理论，而经济模型是一种简化、抽象地描述现实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总是在严格的假定条件下得出结论，因此其结论通常是一种假说。在这样的研究方法下，模型的设定往往会舍去许多因素，而假说意义的结论通常又和实际有一定的差异，这就使西方经济学界在研究中往往容易割裂通货紧缩及其国际传导的各原因和各机制的内在联系，从而在深入分析各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作用机理方面比较欠缺，以至于不少学者对有关问题的研究要么从货币层面，要么从实体经济层面展开，结果是强调一个方面却又忽视了另一方面。

中国经济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出的，由于实际情况的限制，中国经济学界对通货紧缩的研究较少，更多的时候是运用西方经济理论界的有关观点来研究中国转型时期的通货紧缩问题。这不仅使中国理论界对通货紧缩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染上了西方理论观点的不足，而且，作为中国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的通货紧缩问题时主要强调对西方理论的借鉴，对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却鲜有运用，这本身也是一种缺陷。

实际上，尽管马克思并没有专门研究通货紧缩，甚至也没有使用过通货紧缩这个术语，但这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对研究通货紧缩的指导作用，尤其是《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及基本观点对通货紧缩问题的深入研究至关重要。根据马克思本人的论述，《资本论》中应用的最主要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除此之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运用了一系列具体的方法，从而形成了《资本论》方法论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些方法主要包括：科学抽象法，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及区别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的方法。马克思运用敏锐的观察力，牢牢抓住主要矛盾，透过现象看本质，运用矛盾分析法以及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①。很显然，《资本论》的理论研究是深层次的，它不仅分析经济运行中的现象，而且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正是西方经济理论界在研究通货紧缩时所欠缺的、非常重要的方法，是研究通货紧缩及其国际传导的科学方法。此外，《资本论》还为通货紧缩及其国际传导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资本论》对价格的起源和本质及货币的本质和职能、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对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及经济危机的研究，《资本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从具体到抽象，又由抽象上升到具体，依照现象—实体—本质的逻辑层次，全面深入地阐述的商品经济的特殊和一般，所有这些，都为通货紧缩问题及商品货币关系下的其他经济问题的研究夯实了理论基础。

不过，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随着现实经济条件的变化，政治经济学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巨著，《资本论》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发展，新现象、新问题层出不穷，基于时代的限制，马克

^① 吴树斌:《浅谈〈资本论〉研究方法在当前经济理论研究中的应用》，载《辽宁大学学报》，1998（1）（总第149期）。

思不可能对当今经济实践的各个方面都进行深入的研究和作出充分的预测。另一方面，局限于当时的科学的研究的整体发展状况，一些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和工具的运用也十分有限。因此，对《资本论》的一些观点和方法，应该随实践的发展不断地促其发展，即使是对于作为《资本论》的理论基石的劳动价值论，中共中央也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

鉴于《资本论》的局限和西方经济理论界在研究通货紧缩方面的缺陷，由于经济理论研究的历史继承性，要全面、深入、系统、科学地研究通货紧缩，包括通货紧缩的成因和国际传导，就必须运用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以《资本论》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同时合理借鉴西方学者的通货紧缩理论，使通货紧缩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完善。然而，这里的关键是，《资本论》原理和西方经济学界的通货紧缩理论是否可以结合运用？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讲，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商品经济是有特殊性的，但作为客观的经济运行机制，商品经济一般是适用于一切商品货币关系的。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经济理论界在揭示商品经济、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些共性问题方面的经验和思想积淀，与马克思理论所揭示的商品经济一般是有通融性的。具体就通货紧缩问题的研究而言，《资本论》与西方经济理论在货币理论、价格理论等方面既相区别又具有某些一致性的观点是可以相互补充的，马克思关于货币、价格等的起源和本质的研究可以解决西方经济理论在这些问题上的缺陷，而西方经济理论的有关研究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马克思的研究的历史局限，尤其是西方经济理论界通过继承、补充与发展，逐渐形成的研究通货紧缩的某些方法和理论，可以提供一些研究通货紧缩的具体方法、分析工具和理论借鉴。

基于这样的认识，再结合国内外经济学界在研究通货紧缩及其国际传导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本书尝试应用唯物辩证法和从

一般到具体、由表及里的方法，以及逻辑和历史相统一、分析和综合相结合、归纳和演绎相结合及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方法，以通货紧缩的含义为切入点，以《资本论》的有关原理为基本的理论工具，同时借鉴国内外经济学界关于通货紧缩及其国际传导的理论研究成果，综合应用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及国际金融的基础知识，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对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的机制及防治对策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为了论证主题，本书按四个版块共八章展开分析：

第一个版块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这是全书的理论基础。作为切入点，第一章重点分析通货紧缩的含义和危害，目的在于为后续章节的分析建立基本的概念框架，并为通货紧缩形成原理的一般分析提供循着价格下降而逐层推进的路径，同时初步说明本研究的意义。第二章从一般意义上分析通货紧缩的形成机理，基本目的有两个：一是通过对通货紧缩形成原因的理论观点的梳理，说明现有研究的意见分歧和理论工具及研究方法的不足，从而确立《资本论》基本原理及研究方法的基础性的指导意义；二是依据《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及研究方法，沿着价格水平持续下降的形成机制，由表及里，依次分析货币因素、供求因素及各种深层次因素在通货紧缩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从而揭示通货紧缩形成原因之间密切联系的整体性、系统性，并说明通货紧缩的可能性存在于商品货币关系内部的客观性。这样既为后续章节分析通货紧缩国际传导可能性的客观存在及其各传导机制间密切联系的整体性、系统性奠定基础，同时也便于通过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直接引出第三章的分析。

第三章是本书第二个版块的第一部分内容，除第三章外，这个版块还包括第四、第五章。这三章是关于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的理论分析，在整个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这个部分承接第一个部分的分析，从理论推导的角度分析通货紧缩国际

传导的作用机理；另一方面，这个部分也为后续内容的分析提供理论依据。承接第二章的分析，第三章首先通过开放经济条件下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构成中的出口需求和进口供给引入通货紧缩形成中国际因素的作用，然后在定义通货紧缩国际传导概念的基础上，分析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通货紧缩国际传导可能性的客观存在，同时引入国际资本流动等因素，并通过对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理论观点的梳理，归纳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的主要机制，分析现有研究的薄弱环节，推导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的作用机理及传导机制的内涵，由此确立各传导机制之间的整体关系，引出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的渠道和主体，为第四、第五章的分析奠定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第四章具体从国际商品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劳动力国际流动及技术和信息流动的角度分析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的渠道，揭示有关传导机制通过相应的渠道结合作用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作为所有传导渠道经济活动的货币反映的国际收支变动传导通货紧缩的实质。第五章具体从跨国公司等微观主体、国家政府、国际组织的角度分析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的主体，揭示各主体对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的影响，从而为对策分析中关于政府作为和国际组织作为的建议的提出奠定基础。

第三个版块包括第六、第七章，这个部分也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这部分以事实证明前一部分的理论推导结果，同时又利用已经证实的理论推导结果预测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的趋势，从而为第四个版块即第八章的对策分析奠定基础，使第八章能够由有关理论分析和实践证明，水到渠成地引申出防治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的意义和基本原则及对策。具体讲，第六章是关于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的案例分析，通过对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时期及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通货紧缩的分析，一方面以历史事实印证前述章节的理论演绎结果，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通货紧缩虽然会通过贸易等途径影响他国经济，但不会根本影响他国和国际市场的价